

传教士在南京成为教育家



不知司徒雷登有没有想到,他的两次命运转折,居然都和南京有关

1908年,美国人司徒雷登离开杭州,来到南京,从此与南京结下不解之缘。司徒雷登虽然是个美国人,但他却于1876年出生在中国杭州,因为他父亲是最早来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之一。长大后,司徒雷登回到美国,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神学。1904年,他受到南长老会派遣,重返中国杭州传教。

●司徒雷登为何踏上南京之旅?

●他是怎样由一个纯粹的基督教传教士转变为教育家的?

●为什么南京会成为司徒雷登的“福地”?

●司徒雷登作为凡人在南京有哪些生活故事?

九旬老人记忆中的金陵神学院

昔日的金陵神学院究竟在哪?如果还在,应该是百年老校了。一些资料含糊其辞,金陵神学院在如今的华侨路一带,可具体的地址谁都说不上。来到华侨路,向那里的老居民询问,他们用手一指:大铜银巷。

这是一条和上海路交叉的巷子,在居民的指点下,远远地就可以看到很长的围墙,围墙里面非常静谧,门口挂着“金陵协和神学院”的牌子。里面的两栋民国建筑由青砖垒砌,别有一番风情。

这就是司徒雷登曾经就职的地方?经过一番软磨硬泡,记者终于见到了神学院已经退休的副院长陈泽民。老人90多岁了,家和神学院仅仅一墙之隔。“我见过司徒雷登,他是风云人物,他的一举一动我们都很关注的。我的老师诚质怡曾经是他的同事。”往事就像旧挂历一页页翻过,陈泽民戴着一顶毛线帽,思路清晰,样子十分可爱。

不过,老人告诉记者,金陵协和神学院并不是司徒雷登曾经工作过的地方。现在大家看到的地方,是1952年由金陵神学院和金陵女子神学院合并起来的,实际上是金陵女子神学院的所在地。真正的金陵神学院不在此,老人向记者指了指马路对面:上海路、汉口路、南京医科大学的大部分、江苏省中医院的大部分都是金陵神学院的。解放后充公了。

“以前,江苏省中医院那一片是金陵神学院的养牛场和幼儿园,南京医科大学这边是学校的本部。金陵神学院很大很大,不过,1931年,因为汉中路开拓,金陵神学院被一分为二,分成了南北两部分。”

老人的目光悠远,以前,金陵神学院的洋教师们住的是洋楼,大铜银巷和上海路一溜儿民国仿西洋的建筑。

这些建筑都是带院落的小楼房,当时,司徒雷登的“家”应该就在上海路2号的小洋房里。遗憾的是,如今已经没有了,上海路也成了高楼的驻扎地了。

司徒雷登不仅会说南京官话还会吴语粤语

南京医科大学东南角,两栋民国建筑给这所学校增添了别样情调。医科大学的东门边上,一栋黄白相间、不规则的民国洋房静静地矗立着。房子坐北朝南,所有的雕饰都在正面。白色的花蔓浮雕一串串地“爬”在黄色的墙体上,圆形精致的门券,红色木质楼板,虽然已近百岁,但依然雍容华贵。乍一看去,真让人以为是哪个西洋教堂呢。这个洋房的不远处,还有一个通体黄色的民国建筑,地板楼梯全部是木质的,为了保护木地板,学校特意在上面铺了一层红地毯。

如今,这两栋建筑都成了老师们的办公楼。这两栋建筑,就是金陵神学院遗留下来的老建筑。“一栋是礼堂,一栋是学生宿舍。”这两栋建筑曾经见证了金陵神学院的沧桑与沉浮。如果时光能够倒流,90多年前,这里还能看到一个洋传教士的身影,他就是司徒雷登。

司徒雷登是怎么来到南京的?他当时来南京又是为甚?1907年,为纪念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100周年,在华的各国传教士召开了一个“百年纪念大会”,并在会上通过了成立“教育总会”的议案,把在中国兴办中等和高等教育列为20世纪教会工作的重点,同时呼吁各派别的教会组织团结起来,联合创办学校。美国南长老会和北长老会在华传教的历史也将近有100年。经过总结,他们认识到基督教之所以在中国的发展十分缓慢,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外国人传教很难被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接受,而中国又没有自己的高级神职人员。因此,积极培养中国本地的高级教会工作人员就成为当务之急。于是,这两个教会组织决定在南京联合创办一所神学院,并为此所神学院取名为金陵神学院。金陵神学院以纽约圣经研究院为模式,“欲以欧美同等,最高之神学教育,培植中国青年,成为优秀人才”。以此为宗旨,学校董事

会开始挑选品学兼优者担任教师。司徒雷登是他们聘请的第三位教师。

收到邀请,司徒雷登就同意来南京了吗?是否生命中注定他就会成为教育家呢?司徒雷登的同事李汉铎的女儿李文智说,“一开始司徒只想一心传教,并不想成为教育家,但不知道是谁说通了他,让他来到了南京。”1908年,司徒雷登带着妻子、妻子从杭州迁到了南京。

“他当时在神学院既是教授,也是财神爷,掌管学校的财务。”李文智告诉记者,司徒雷登非常有语言天赋,他会很多种语言。他当时教两门课,分别是希腊文和希伯来文,但课堂上,他坚持用汉语教学,他的中国话带有一点杭州口音。事实上,他还会说地道的南京官话和粤语,“来南京之前,为了更好地与学生交流,他特地到庐山拜师学习南京官话。”为啥要到庐山去学,而不在南京本地学呢?李文智哈哈大笑,“他给我印象就是一个很幽默的人,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庐山学南京话。”有趣的是,司徒雷登学成之后,发现自己的学生竟然多半是外地人,根本用不着南京官话。

司徒雷登在南京有没有结交到本地朋友呢?来南京后,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?除了教书,他还喜欢干什么?

凡人司徒雷登的家居生活

“司徒雷登从金陵大学创办就来南京了,他在金陵大学认识了我爸爸,后来还推荐我爸爸当了金陵神学院第一任华人院长。”司徒雷登和李汉铎的关系有点复杂,师生?朋友?同事?应该都是,但也不完全对。

李文智说,司徒雷登比他父亲大10岁,父亲还在金陵大学读书的时候,司徒雷登已经在那里当老师了,后来两人成了同事、好朋友,一直到司徒雷登去了北京,他和李汉铎还有书信往来。

而在陈泽民的印象中,司徒雷登是一个求贤若渴的人,他很会用人,没有架子,很谦虚。“他当时住在上海路,他结识了正在协和医院任教的传教士伦道夫·希尔兹,两人同住一栋楼房,结下深厚的友谊,他们的妻子也亲如姐妹。”在这段日子里,司徒雷登每天上4小时的课,余下的时间用来备课、研究,处理行政事务,学习汉语,有时候到不远的金陵大学去讲道,教圣经课。他讲授的课程包括:《新约》、希腊文《新约》讲座、现代传教史、教会史等,同时,他的领导才能和待人接物的诚恳,

也受到各方面的关注。

除此之外,司徒雷登也一直在物色人才。当时,土生土长的基督教牧师中没有一个正规的大学毕业生,金陵神学院的教学质量并不理想,高年级学生只相当于高中程度,低年级学生则只有普通私塾的水平,根本无法满足培养教牧领袖的需要,而神学教育本身的落后,又使很多有才华的青年不愿意入神学院。

教学中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:怎样才能激发中国学生的求知欲,而又不超出他们的理解力,同时还扰乱他们原来的信仰?司徒雷登采用“因材施教”的办法,深入浅出,按照现代需要来组织教学,提高教学水平,甚至从世俗大学的毕业生中破格培养潜在的牧师候选人。不久,他发现了金陵大学的毕业生李汉铎,把这个青年人选为牧师。15年后,李汉铎成为第一个由华人担任的金陵神学院院长。

当搬运工护送剪辫学生逃出南京

“他也喜欢中国文化,在这段时间,他研究中国历史,学习中国哲学。他对孔子很有兴趣,研究孔子的儒家思想。”李文智说,在一些照片中看到,司徒雷登都是西装革履的,但实际上,当时的外国传教士都比较能吃苦,他们平时穿衣风格也很本土化。“很多人认为,他们的家具会非常西化,但实际上,司徒雷登当时的家具都是在南京本地买的,和一般人家没啥区别。出门坐马车,或者黄包车,大多数是步行。”

但一心一意投身教育的司徒雷登,并不一帆风顺。在这段时间,他遇到激荡的革命浪潮,留长辫的中国学生们剪掉辫子,“革命”了。在当时的时局下,司徒雷登怎么办?

那是司徒雷登到南京的第三年,1911年10月10日,武昌的新军士兵举行起义,建立了湖北军政府,其他各省纷纷效法。江西、江苏、安徽三省宣告独立,整个国家笼罩在革命的风暴之下。司徒雷登十分兴奋,南京的青年学子们更是热血沸腾,纷纷剪掉辫子响应。学子们并不太了解革命是怎么回事,认为当务之急是剪掉象征异族统治的辫子。镇守南京的江南提督张勋仍旧效忠清朝,大肆逮捕革命党人,杀戮无辜,凡剪掉辫子者一旦被发现,就有丢掉性命的危险。学校因而停课,但严禁学生离城返回家乡。

在这种形势下,司徒雷登和别的西方教师一起,组织起救助委员会,轮流护送学生离城。每天早晨南京仪凤门放行的时候,他们把剪掉的辫子逐个别在学生头上,掩护他们出城。运输工人慑于军令,不敢为学生搬运行李,学生自己搬运行李时,常会因假辫被行李钩住而败露。司徒雷登与其他西方教师干脆充当了搬运工,每日护送学生出城,直到江浙革命军赶走张勋为止。

学生离开后,金陵神学院也暂时停办,司徒雷登随美国领事馆离开南京,回到杭州住了一段时间。不久,他就接受美联社的邀请,担任驻南京特约记者。司徒雷登干劲十足地

投入了新的工作,每天撰写电讯,报告中国时局的发展。1912年4月1日,孙中山发表演说,宣布辞去大总统职务,让位于袁世凯,司徒雷登是在场的唯一外国记者,也是唯一的外国人。

司徒雷登在南京写下三部著作

时局渐趋稳定的时候,司徒雷登家里却发生了变化。司徒雷登的父亲去世了,加上他的妻子生孩子落下了病根,于是,他带着妻子回美国,给妻子看病。但不久之后,他又回到了南京,把母亲也一起接了过来。

重新回到学校的司徒雷登继续当他的教授。在同事陈句应的帮助下,司徒雷登完成了50万字的《环球布道小史》。这本书讲述了现代传教运动的历史、现状和前景,被当时的神学院广泛采用为教材。在下一个年度里,司徒雷登又潜心撰写了《希腊文初阶》。以往中国人学习希腊文,都要通过英文来学习。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直接学习希腊文,司徒雷登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,撰写了这部专为中国人学希腊文使用的课本,书中所有解释完全采用汉语。

差不多在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前后,司徒雷登编纂完成了《新约希英辞典》,这是司徒雷登历时5年呕心沥血的巨著。脱稿后,由于排印难度过大,一时找不到愿意承担印刷的机构,司徒雷登就亲自训练排字工人,终于使它得以面世。

同时,司徒雷登作为教育家的声望日益卓著。这一年,他出任中华续行委员会特设的神学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,从而成为神学教育界的领袖人物之一。这为他后来来到燕京大学担任校长奠定了基础。1919年,北京要成立一所联合大学,但因各派争执不下而陷入僵局,当时普遍认为,必须由一位与各方都无所牵连的局外人出任校长才能打开局面,司徒雷登因此作为合适人选被举荐出来。这年1月31日,司徒雷登到达北京。他坐着一辆临时雇来的黄包车,顶着深冬凛冽的寒风,来到位于城北的长老会布道团上任。

司徒雷登这一去,直到20多年后才重回南京,但回来时,身份已经由教育家变成了政治风云人物。但对于司徒雷登的政治生涯,陈泽民说,司徒雷登要是专门搞学术,不去当大使,就不会落得骂名了。司徒雷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,很有趣,很有学问。

司徒雷登也很清楚即将发生的这种变数,在就任大使前的一次欢迎会上,他将来送行的胡适与自己作了对比,并说:“他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(胡适辞去了驻美大使的职务),返回了北平当大学校长,可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,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,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。”

命运齿轮再次转动,司徒雷登该怎么办?

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胡玉梅 毛丽萍